

# 论普雷维什的特权消费社会思想

张海防 宋娟\*

〔摘要〕 在普雷维什看来,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即拉美国家是典型的特权消费社会;特权阶层凭借经济、政治、文化等特权攫取了巨额经济剩余,其中大部分被他们模仿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奢侈消费方式消耗掉,从而造成了再生产资本积累的巨大浪费,以致于社会体系缺乏动力和活力,各种危机频发。普雷维什的特权消费社会思想启示我们:只有全面贯彻从严治党战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强拆特权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的藩篱,崇尚俭朴精神,才能避免重蹈“拉美发展陷阱”的覆辙;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

〔关键词〕 特权消费社会;经济剩余;危机;改造

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 1901—1986)是阿根廷著名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拉美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拉丁美洲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代表”。<sup>①</sup>普雷维什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过程中形成了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中心,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是外围,外围依附于中心,中心控制外围。作为外围的拉美地区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消费文化等方面依附于中心国家,并受中心国家的控制。长期以来,由于跨国公司的积极倡导以及大众传媒的影响,拉美国家的特权阶层不顾落后国情,盲目模仿中心国家的奢侈消费方式,对高档产品和服务有着强烈的消费欲望,形成了独具拉美特色的、畸形的特权消费社会。特权消费造成了资本积累潜力的巨大浪费,特权消费社会是一种缺乏发展动力的、排斥性的和持续螺旋式通货膨胀的危机性社会。改造特权消费的关键是在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寻求一种综合,让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经济剩余。普雷维什的特权消费社会思想立足于发展中国家,旨在规避发展陷阱、破解发展困境,试图为拉美国家寻找一条充满动力和活力的发展道路。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我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张海防,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研究员,210023;宋娟,临沂大学讲师,276005。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研究”(13ZD001)和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

①董国辉:《普雷维什命题:历史与现实》,《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3期。

## 一、特权消费社会: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社会形态

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即拉美国家是典型的特权消费社会。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大企业家、大农场主、大官僚等社会上层,凭借经济、政治、文化等特权占有经济剩余,而这些剩余的大部分又被他们模仿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奢侈消费形式消耗掉,从而造成了再生产资本积累的巨大浪费,使得社会体系缺乏动力和活力,各种危机频发。

首先,特权消费社会是特权阶层侵吞绝大部分经济剩余的社会。经济剩余是普雷维什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普雷维什看来,经济剩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利润概念都来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利润是暂时的,一旦经济体系达到均衡状态,就会逐渐消失。经济剩余却是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结构现象,它不会消失,将永远存在。因为外围资本主义是一种异质性社会,既存在着一些技术先进、生产效率极高的部门,例如与中心国家经济联系密切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也存在着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的众多部门,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雇佣的工人也多。随着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一些低层次部门的工人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工作,但是他们的工资却因为工人之间的倒退性竞争而没有相应地增加,于是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就保留了一些超过他们正常报酬的经济剩余。可见,经济剩余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不是均质的,没有分配给劳动力大众而留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的那部分因提高生产率而取得的成果”<sup>①</sup>。绝大部分的经济剩余留在大企业家和农场主那里,他们阔绰豪华的生活方式和显赫的金融地位,对那些在国家领域中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权的官僚产生了难以抵抗的诱惑力,这些官僚急需寻租手中掌握的权力。于是,政府官员的决策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某些私人或私人集团提供便利。投桃报李,大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特权官僚共同分享经济剩余。当官商勾结分享经济剩余在国家上层发展的时候,也会向下层快速蔓延。一些地位低下、在国家机构或私营部门中报酬低的中小官员,也通过腐败的途径占有经济剩余,以改变入不敷出的生活困境。普雷维什说:“特权不在于利润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有不受限制的竞争,这个成果的一部分——在外围资本主义中是很大的——将作为经济剩余被扣留。”<sup>②</sup>广大群众创造的大量剩余被特权阶层侵吞,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其次,特权消费是盲目模仿型的社会,即拉美国家盲目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普雷维什认为,外围国家难以成功地模仿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心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同质性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且能在社会上、中、下层间快速地普及。然而,外围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异质的和排斥性的,相对先进的技术只能局限于某一部门,最终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再者,中心国家本质上是向心性、吸收性和统治性的,它们只是把外围当作廉价原料的来源地和倾销工业品的市场,不希望外围国家发展成为与他们势均力敌的对手。因此,中心国家丝毫没有促进外围国家发展、繁荣的意图,总是人为地设置各种技术、贸易壁垒,千方百计地阻碍外围国家的发展。为了倾销工业品,尤其是奢侈消费品,中心国家倒非常乐意外围国家模仿它们的消费方式。在外围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形式,宣传中心国家的消费文化,“人们想要的东西大部分是集体的迷惑艺术的结果”<sup>③</sup>,使得消费主义思潮在外围国家泛滥。那些攫取了大量剩余的特权阶层,为了炫耀财富,展示身份,不顾落后国情,大肆地购买豪车,修建豪宅,穿高档服装,佩戴高档手表,使用国际名牌包,等等。在拉美国家,一些高档服务和娱乐场所,比如高档医院、贵族学校、奢华娱乐场所

① [古巴] J.科多维,余幼宁译:《评R.普雷维什目前观点的某些方面》,《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

②③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3、11页。

等遍布全国的大小城市。奢侈消费现象不仅局限于社会上层,而且也蔓延至中层,下层虽然无奢侈消费能力,但是心理上对奢侈消费也羡慕不已。经济剩余本质上是一种结构现象,也是一种动力现象,特权阶层的奢侈消费造成了资本积累潜力的巨大浪费,使得外围资本主义缺乏发展动力。相反,中心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本和财力,以及繁荣的奢侈品市场,人们的奢侈消费水平与自身的收入状况相适应,消费结构相对合理,奢侈消费能拉动中心国家的经济发展。

再次,特权消费社会是以奢侈消费为价值本位的社会。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奢靡之风盛行,奢侈消费成为社会时尚。攫取巨额经济剩余,然后奢侈消费,是大企业主、大农场主、大官僚等社会上层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与此同时,社会的中层和下层,尤其是那些失业的人们,生活穷困潦倒,构成了低消费社会。普雷维什认为,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一种俭朴精神,不过外围国家照抄中心国家的经济理论,而“忘记了亚当·斯密在发表他那部不朽著作之前曾经写过关于道德情感的理论”<sup>①</sup>。普雷维什曾访问过日本,对日本的俭朴资本主义赞赏有加。他认为:日本不是特权消费社会,经济剩余也没被外国榨取;不仅社会上层,而且全体居民都崇尚节俭;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被用于生产积累,“日本的发展是以极高的积累速度、特别是以极高的再生产资本积累速度为特征的”<sup>②</sup>。外围资本主义不会发展成为日本那样的俭朴资本主义,而是根深蒂固的特权消费社会。因为由各种大众传媒营造的奢靡之风,早已让拉美国家的特权消费者们丢失了自我,成为“受控制的消费主体”。他们以追逐经济剩余最大化为己任,不顾企业发展,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而是热衷于奢侈消费,引领奢靡风尚。虽然在拉美社会中存在着利益固化的藩篱,但是仍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可动性。一些社会底层的人以追求奢侈消费为价值目标,凭借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活动能力,增加其生产资料的占有量。他们以无可置疑的战胜阻力的本领最终跻身于特权阶层,分享经济剩余,并以奢侈消费为手段彰显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他们又设置障碍阻止其他人进入社会上层。在这种排斥性的社会体系中,若让特权消费者们放弃奢侈消费,崇尚节俭,无异于与虎谋皮。

最后,特权消费社会是危机频发的社会。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落后,社会结构具有排斥性和对抗性的特征,人们不关心技术进步、生产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而是勾心斗角、千方百计地争夺经济剩余,沉迷于奢靡之风,让社会变得腐朽、沉沦,充满危机,比如贸易条件恶化、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经济螺旋式通货膨胀、政治动荡不安、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普雷维什认为,特权消费社会存在着贸易危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只适用于中心国家之间,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并不适用,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贸易不能实现互利互惠、互通有无。旧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秩序有利于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的中心国家,而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国家,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从产品的科技含量上看,工业制成品因为技术含量高、生产效率高、需求弹性高,所以边际收益递增。然而,初级产品因为技术水平低、生产效率低、需求弹性低,所以边际收益递减,这就造成了国际市场上,相对于工业制成品而言初级产品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心不仅全部占有了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收益,而且剥削外围,抽取一部分经济剩余,使得外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从贸易的运动周期看,在贸易上升阶段,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并且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高于工业制成品。由于中心国家的工会压力和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工人工资增加。然而外围国家工会力量弱,工人工资难以增加,仍然在低水平徘徊。于是,工业制成品的工资成本高于初级产品,价格自然居高不下,而初级产品的价格始终处在低位。在贸易下降阶段,工业制成品因为垄断了市场和销售,价格相对稳定,而初级产品的价格会大幅度下跌,如此反复,使得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价格差距拉大,一部分经济剩余流向中心国家,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逐年恶化的趋势。

---

①②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325、66页。



在普雷维什看来,特权消费社会缺乏发展动力,存在着动力危机。外围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和长期恶化的贸易条件,必须发展民族工业,实施替代进口政策,出口工业制成品,改变单纯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不利状况。然而,特权消费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再生产资本,而且误导了生产方向,使得社会体系缺乏动力,以至于阻断了拉美国家民族工业化的道路。从需求结构上看,特权消费影响需求构成。特权阶层总是追求高档的、多样化的消费和服务,这些消费和服务多数由中心国家生产和提供,即使拉美社会对奢侈品消费的需求量巨大,也不会成为拉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动力,只能让经济剩余大量流向中心国家。可见,特权消费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需求结构,这种需求结构对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着决定性影响。外围资本主义追求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以满足特权阶层的奢侈消费需求;外围资本主义追求高档私人服务,而不是满足大众的需要。例如,在医疗服务方面,特权阶层对中心国家的高端医疗服务羡慕不已,他们花巨资建设豪华医院,高薪聘请留学归来的专业人员,以满足少数人的消费需求。如果将这些投资用于社会基本医疗,就能让占社会多数的中层和下层得到最起码的医疗服务,也能吸收众多劳动力尤其是普通医生就业。假设就业收入转化为合理的消费需求,就能拉动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增添动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特权消费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危机频发。特权消费社会两极分化,是一种排斥性、对抗性的社会体系。它的一极是繁荣、富足,奢侈消费,另一极则是持续贫困,人们难以维持基本生存。随着外围资本主义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间阶层逐渐发展成为新的社会集团,凭借自己的社会、工会和政治权力要求增加报酬,提高工资。政府为满足中层增薪、大官僚特权消费以及军费开支等需求,不得不加大税收的力度。各种税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分摊到劳动力的身上,尤其是被企业劳动力分摊,于是他们就谋求补偿。为了满足工人的工资补偿要求,企业主们就哄抬物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求助于膨胀性税收,即依靠财政赤字,发行货币,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于是,税收加大、工资增加、物价上涨,如此反复循环、周而复始,引起经济持续衰退,这就是外围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即螺旋式通货膨胀。

螺旋式通货膨胀源于社会体系内部的冲突和对抗,是结构性的,不能用货币手段加以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复辟势力抬头,它们用军事强制手段竭力恢复占有经济剩余的基本准则,整顿外围资本主义的运转秩序。然而,复辟势力只代表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群众基础薄弱,统治地位不稳固。相反,民主势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力量相对强大。民主阶层通过斗争可以争取到再分配经济剩余的权力,甚至一度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由于民主阶层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不能控制经济剩余,也不可能坚定地引导这种制度。另外,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与拉美特权消费社会之间利益相连,是特权阶层的坚定支持者。应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妄图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sup>①</sup>因此,为了维护它们分享经济剩余的权力,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等方面干预拉美内政,全力支持复辟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复辟势力往往孤注一掷,不惜采用暴力的方式恢复统治。于是,外围资本主义便进入了一个“再分配—危机—复辟”的恶性循环周期,政治动荡不安,掉进了拉美发展陷阱中。

## 二、解构特权消费社会的基本路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普雷维什认为,经济剩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它来源于社会不平等;如果社会平等,不存在倒退性竞争,劳动力的报酬与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相一致,经济剩余就会消失;改造特权消费社会的关键在

---

<sup>①</sup>王永贵:《新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红旗文稿》2015年第5期。

于,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经济剩余的社会使用,这不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管理权集中到国家手中,而是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条件下,凭借企业自治委员会,实现民主决策、计划管理经济剩余。普雷维什说:“我主张的社会改造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以确保发展的活力、分配的公正、逐步民主化以及它所固有的各种价值。”<sup>①</sup>普雷维什理解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苏联模式的正统社会主义,“它是指经济剩余不再根据个人的决策来使用,而是根据集体决策用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和逐步纠正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差别”<sup>②</sup>。在大企业中,大企业主占有多数资本。然而,随着再分配的实施和科学技术的推广,企业劳动力占有资本的比例就会增长,以至于成为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出资人要求企业自治,实行集体管理。所谓集体是指企业全体人员,包括领导人和技术人员等级、中级职员和熟练工人等级、低级职员和非熟练工人等级。如果国家占有股份,还应该有国家的代表。三个等级的代表、大企业主代表和国家代表共同组成企业自治委员会。企业自治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制定经济剩余的使用计划,按照计划遏制特权消费,把经济剩余合理地用于企业积累、教育投入、消费和国家开支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在技术落后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由于受到良好教育、掌握了先进科技,就能向上流动,到大型企业中就业,从而分享经济剩余。这种动态的分配方式,即在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动过程中分配经济剩余,能让占社会多数的底层劳动力增加收入,这些收入又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刺激企业的生产,拉动经济发展,最终淘汰落后企业。普雷维什还设想,大企业主在获得一定量的资本利息补偿后,应该交出企业的管理权,让大企业高度自治,自主地管理经济剩余。对于企业主能否将管理权交出,普雷维什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只要(建立在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权力关系能够维持剩余的占有,就几乎不能设想通过民主的方法使把剩余看成头等重要并且独占剩余的人物同意放弃剩余。但是,如果出现体制危机、经济混乱和社会分裂时,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的民主努力超过上层阶层的力量,也许有可能被迫将管理权交出”<sup>③</sup>。

普雷维什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指:“如此再分配的收入可以按照个人的决策自由地在市场上使用,同时,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某些刺激决定如何更好地满足开销其收入的人们的需求,以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分配其拥有的资本。”<sup>④</sup>也就是说,“让市场作为有效的机制,但不是作为发展的最高调节者”<sup>⑤</sup>。经济自由主义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坚信,如果没有计划干预,取消了再分配权力,让市场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生产率成果必然作社会性扩散,最终能达到合理分配和社会公平。普雷维什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只适用于中心资本主义,而不适用于外围资本主义。对外围资本主义来说,市场从来都不是经济的最高调节者,不具备宏观调控的功能,“市场既缺乏社会视野,也缺乏时间视野”<sup>⑥</sup>。市场的运转受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它既不能解决积累问题,也不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面对着可耗尽资源被恣意开发、生态环境危机的状况,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就不能继续奢谈市场规律能有效地配置资源。

普雷维什认为,市场的功效存在于微观领域,它对外围资本主义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市场意味着市场主体有生产和消费的自由。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能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配置资源,根据市场需求状况自主地生产、经营。消费自由是个人自由的重要内容,个人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资金状况等自由地消费。普雷维什的自由观是:“在少数人的自由不损害他人自由的情况下,多数人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不能剥夺他们的消费自由。”<sup>⑦</sup>然而,那些交出企业管理权的企业主,仍然拥有巨额资本利息,占有大量经济剩余。当他们在行使消费自由的过程中,因欲望过度膨

①②④⑤⑥⑦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77、282、282、20、328、296页。

③ [日] 直松忠博:《劳尔·普雷维什的外围资本主义论》,陈成立译,《国际经济评论》1983年第11期。

胀而进行奢侈消费,浪费大量经济剩余、带来社会危机的时候,就损害了中下层的消费自由,致使广大群众在贫困线上挣扎,在低消费社会中生活。

普雷维什认为,外围国家应该多管齐下,采取多种措施制止不道德的、损害多数人消费自由的奢侈消费。在经济上,普雷维什建议国家征收消费税,以遏制特权消费、推动资本积累,并将其赞誉为“一条推动资本积累的最好途径、能导致剩余社会使用的最佳途径”<sup>①</sup>。在法律上,他建议国家制定法律条款,强制规定经济剩余用于积累的数量和比例,达不到积累标准的企业法人被视为违法甚至犯罪,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在道德上,倡导俭朴精神。以禁欲主义为特征的新教伦理,是中心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精神信仰,外围资本主义应该学习中心国家的人们视辛勤工作为天职、勤俭节约的精神,而不是盲目模仿它的腐朽方面,即奢侈消费。经济剩余是劳动者创造的,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崇尚奢侈消费的特权阶层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把属于社会的经济剩余据为己有。非道德、没有责任意识的特权消费社会是垂死的、没有灵性的,因为它缺失了灵魂和动力,特权消费社会的危机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危机。一种社会体系即便其合理性再大,离开了精神价值,就是一盘散沙,不能形成内聚力。因此,从道德方面遏制特权消费的办法是:倡导俭朴精神,崇尚利他而不是利己的社会价值观;营造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良好社会风尚;把经济剩余积累起来,为集体谋利益。

### 三、特权消费社会思想的当代观照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情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普雷维什的特权消费社会思想虽然带有些许乌托邦主义的空想成分,但是一些思想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比如:特权消费浪费再生产资本积累潜力,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引起危机;外围不能盲目模仿中心,要摆脱对中心的各种依附,走自己的路;遏制特权消费、倡导俭朴和节约的精神等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要加大反腐败力度,拆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让收入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普雷维什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特权阶层,市场从来都不是经济的最高调节者。利益集团凭借公共权力和资源支配权力,在不健全的市场中投机钻营,从事寻租活动,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经济剩余,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分化。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每个国家都会出现各种利益集团,即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经济剩余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集团是社会的毒瘤,滋生腐败和危机。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的特权利益集团在1957年底基本消失。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特权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壮大。有学者把中国的特权利益集团概括为七大类,即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国有大企业及其高管、房地产开发商、大的民营企业、跨国资本的国内代理人以及部分专家学者。这七类特权利益集团又可以被归为四大类,即权贵资本利益集团、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实业资本利益集团、知识资本利益集团。<sup>②</sup>特权利益集团本质上是腐败联盟,它们依托地区、部门等“独立王国”,凭借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等手段,占有绝大部分经济剩余。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否认市场规律的作用。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又被看作是万能的,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初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的分配政策误导下,利益集团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使得“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

<sup>①</sup>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国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302页。

<sup>②</sup> 邹东涛、欧阳日辉:《改革: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国教育报》2013年6月15日。



大”<sup>①</sup>。各种特权利益集团攫取了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成果，是当今社会的利益既得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等，需要拆解利益集团，强拆利益固化的藩篱。因为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民主，它与不平等、排斥性的社会结构不兼容。然而，凡是既得利益者，都安于现状、竭力阻碍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sup>②</sup>不可否认，反腐败、惩治贪污犯对于拆解利益集团、净化社会空气有着积极作用，然而这只是治标之策。普雷维什认为，特权是利益集团、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只有剥夺一些人的特权，才是拆解利益集团、实现分配公平的治本之策。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增加中下层大众的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能有效地遏制、拆解特权。普雷维什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过分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必须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要实现社会分配公平，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干扰市场经济的特权。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健全，执政党和政府向社会公众开放权力，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罚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sup>③</sup>。只有推进政治民主化，剥夺利益集团的特权，才能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注重公平，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要消除奢靡之风，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面对拉美国家消费主义泛滥、奢靡之风盛行和危机频发的社会状况，普雷维什渴望外围资本主义普遍形成一种厌恶奢侈浪费、崇尚俭朴节约的良好风尚，把俭朴主义当作社会的灵魂。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自己的灵魂和精神。灵魂和精神能化市场经济的腐朽为神奇，使市场主体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激情的存在物”<sup>④</sup>，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永葆生机和活力。普雷维什认为，拉美特权阶层经济攫取剩余的目的在于奢侈消费。当然，中国的特权利益集团也不例外，有些官员崇尚享乐主义，生活奢靡，“四风”问题严重。他们“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于花天酒地，纵情于声色犬马”，“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sup>⑤</sup>。有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同比增长4%，买走了当年世界46%的奢侈品；本土消费额为250亿美元，境外消费高达810亿美元，76%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sup>⑥</sup>一些人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糖衣炮弹”的攻击下，精神萎靡、毫无斗志，甚至违法犯罪。另外，明星的示范效应极强，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庞大粉丝群、追星族，刻意模仿明星们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广大青少年身心发育不成熟，正处于心理的“断乳期”，往往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些明星生活腐朽、糜烂，热衷于赌博、吸毒、卖淫、嫖娼，严重污染、败坏了社会风气，妨碍青少年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一个人若沉湎于奢华、缺少了精气神，就没有傲骨和脊梁；一个社会若奢靡之风盛行，信仰发生危机，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马克斯·韦伯视新教禁欲主义为中心资本主义的精神，普雷维什设想俭朴主义是外围资本主义的精神。习近平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力量也是无穷的”<sup>⑦</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为社会“立心”、为老百姓“立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可以将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升华、凝练为“大爱”。心中藏有大爱的人们利他，爱国家、社会、人民，他们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那些奢侈消费、生活奢靡的人，往往自私、利己，事不关己、漠不关心，有些人一己之私，甚至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这样的人是庸俗的、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

①《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②刘瑞华：《改革如何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党建》2014年第7期。

③⑤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8、370、1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9页。

⑥王存福：《奢侈品市场内外有别》，《金融世界》2015年第3期。

个心中有大爱的人,不会奢侈消费、精神萎靡,而是充满热情、激情,活力四射,总是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奋斗不已。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常抓不懈,以此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sup>①</sup>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最终解决社会腐败问题,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攻坚克难,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瑕不掩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奢侈浪费现象依然严重,等等。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部分群众的暂时不满情绪,编造谎言,攻击党的领袖,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或者相反。显而易见,这是想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者改旗易帜的邪路,即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邪路的实质是盲目模仿中心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妄图逆历史潮流,走回头路。普雷维什认为,模仿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不能超越自身具体国情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盲目模仿。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原型,模仿原型而产生的个别事物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或影子。同样,盲目模仿中心国家消费模式的特权消费社会,也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像中心资本主义那样的同质性社会,而是在技术、消费方式、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完全依附于中心,使得一部分经济剩余“无痛消失”,被中心国家攫取,模仿型的国家难以逃脱受控制、贫穷落后的宿命。走对路,才有出路。已经站起来、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不会再依附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决不会重走那条死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sup>②</sup>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广阔前景。

(责任编辑:王永贵)

## Raul Prebisch's Theory of Privileged Consumer Society

ZHANG Hai-fang, SONG Ju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Raul Prebisch, the peripheral capitalist countries, i.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re typical privileged consumer society. The privileged class get huge economic surplus by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ivileges in a consumer society. Much of economic surplus is consumed by the privileged people that follow the luxurious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central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consequences are so serious that the reproduc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been tremendously wasted, the social system been short of dynamic, and all kinds of crises emerged. Raul Prebisch's theory of privileged consumer society can teach us such lessons: only when we fully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n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combating corruption, demolishing the fences protecting privileged interest groups, and regarding frugality as honor can we avoid the development trap experienced b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only if we take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we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privileged consumer society; economic surplus; crisis; reform

---

<sup>①②</sup>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171页。